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书斋里的革命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隐入草地的纪念碑

我不喜欢美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如纽约，几乎是上海的急剧放大，加倍地繁华，也加倍地嘈杂，到下个世纪上海大概是能赶上。但是我喜欢那些城市中的绿地，无遮无拦，随时能入内休憩。在那样的草地上，看不到官养的白鸽，按时起落，以点缀广场的天空，却有小松鼠野生野长，一蹦一跳，就在你脚下嬉戏。这样的街头情趣，上海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现了。

以前读过刘亚洲的一篇报告文学，就像北京城里大多数人说话，首先是口气大，北京之外，全是他部下。只记得那篇文章是说在天安门前漫步，称那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为北京人能拿出这样大的一块地皮作广场而自豪。后来我去华盛顿，发现此言不确。中国人大概只习惯把一大块空旷的裸地称为广场了，似乎广场是供人们进行政治集会的地方，而草地只不过是一片小家碧玉，仅供人站在绳栏外观赏。华盛顿纪念碑下的那块绿地，周围有国会山、白宫、林肯纪念堂，也具有政治功能。60 年代社会动荡，它就常被激动的示威人群占领，中国的电影观众可能在《阿甘正传》中见过那时国会山下学生反战集会的浩大场面。只是难以想象广场在大多数时候是平静的，而且是青青绿草，随时随地可以坐下来休憩。示威者一旦撤离，脚下露出那片绿地，大概是天安门广场的两倍，上海人民广场的六倍，其间喷泉淋水，情侣依偎，还有无数松鼠出没。

真正小的不是广场，而是白宫。白宫之小，倒真超过中国人的想象。也许是行政权低于立法权的象征？它是广场周围最为矮小的一幢建筑，两层楼的白色小楼，小得可怜，恰与远处国会山之巍峨雄壮成反照。后来我回上海作过比较，城里的不说了，即以郊区十座县城而论，座座县城的衙门都比白宫大。

华盛顿广场最成功的建筑当数越战纪念碑。我在上海时已不止一次看过它的照片，但身临现场还是感到震撼。令人震撼的不是它的高度，恰恰相反，它打破了以往纪念碑以高度取胜的常规。准确地说，它仅仅是一堵低矮的长墙，起始处稍高出两米，然后以缓慢的坡度逐渐低落下去，末端隐入远方的草地，渐趋消失。

它与其说是一座纪念碑，不如说是众平民发一声喊，把一座虚拟的纪念碑推倒，就让它如长龙横卧，永远作反战控诉。它的墙面是黑色大理石，以统一的印刷体字母镌刻着全体越战死亡军人的姓名，从将军到士兵，不分军阶，以出生年代分区隔，再以姓氏第一字母为顺序。在纪念墙开始的这一端，隔着一块草地，先是一座越战老兵铜塑像：三个衣衫褴褛的士兵，其中一位还是黑人，似乎刚从越南丛林中跋涉而出，精疲力尽，猛然看到远处有一堵死难战友的长墙以及长墙下游走的鲜活人群，一时惊愕，随后即露出一片悲伤，那片悲伤就永远冻结在那尊铜像上。顺着他们的目光往前走，跨过那片草地，走近纪念墙，顺着墙走，走过成千上万死难者，墙越来越低，逐渐没入草地，最后一排士兵的姓名消失在草根深处，就在这里，一抬头，正好接上华盛顿纪念碑迎面矗立，高耸入云！倘若这时有中国人，见如此反差映照，会不会想到他们幼时即耳熟能详的唐代诗句呢？——“一将功成万骨枯”。

到这种时候，你可能还会明白中国的汉字与西文字母的另一差别。汉字的象形特征成全了一门叫做“书法”的艺术，西方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仅仅是把字写好就能成为艺术家，而且是以字计价，日进斗金？每到有纪念性建筑

落成，往往是中国文人和政要卖弄他们书法的机会。凡是有纪念碑的地方，首先吸引人的是纪念碑上的书法与落款，而真正应该纪念的死者姓名，却被那些龙飞凤舞的镏金字迹掩盖。西文由拼音字母构成，太乏味，留不下让文人构思起落间架的余地。每到这种时候，他们很尴尬，拿得出手的只有千篇一律的印刷体。不料这样一来，死者幸运，反倒有助于凸现谁是被纪念的主体。记得在夏威夷珍珠港参观，美国人在当年被日机炸沉的巨舰亚历桑那号残骸上建起一座水上纪念馆。亚历桑那号的万吨残骸沉卧在清澈的海水下，历历可见，纪念馆为一白色棺材造型，就架在残骸之上，垂直交叠，成海面上一巨大十字架。参观者先在此岸免费看纪录片，后由水兵导引，坐海军渡船去对岸瞻仰纪念馆。下船上栈桥，脚下经过亚历桑那号，底下钢铁残躯还有当年残剩的油迹一缕一缕漾出，在海面上流淌，似冤魂 50 年都未流尽。而长方型棺材纪念馆内则什么都没有，耐心走到底，到底一面墙，墙上无任何说明文字，只有印刷体排列着的 2280 人姓名。一看即知，这是珍珠港事件美军全体死难者，按中国人的说法，叫做“以姓氏笔划为序”。偌大军港，此岸彼岸，又是电影，又是海上十字架，走到头，就让 2280 个死难者姓名排印在室内一面墙上，戛然为止，再无一言。谁能想到美帝国主义还有这一手？单调的白墙，单调的印刷体，兜头劈面，黑压压一片！中国人在这种场合的心理期待，是要看到某文人某政要的镏金题词的，一看没有，就可能嘀咕“乘兴而来，败兴而去”。然而仔细一想，还有什么比死者本身更值得凸现？只有这样，才能直逼生命尊严，才能唤起活人对死者的敬重。我也是到那一刻才顿悟，在这种地方，死者因訇然一响而扯平，进入永恒平等，如有等差，只能表现于一点：已逝者比苟活者尊贵，比文人尊贵，比政要尊贵；书法再美，也不能到他们的头上来卖弄。珍珠港是这样，华盛顿广场越战纪念墙也是这样。即以后者而论，数百米死亡之墙能刻上多少死难者姓氏？5 万人以上。

活着的人到那堵墙下表达他们的哀思，常见的是鲜花。但在那一天，我还看见有另一些东西。有老军人坐轮椅而来，只在昔日战友的名下放上一罐啤酒和一对旧军靴，相对茫然；有妻子在亡夫名下摆着一封信，信口封着，无谁触动；还有一对青年男女寻找到一个死者的姓名，正在用铅笔白纸临拓那组印刷字母，也没有人打搅他们。人慢慢走动起来，还会领悟到设计者在那么多的建筑材料中，为何独重黑一色的大理石。那黑色的石头是有灵性的，它能反光，蓝天白云，芳草碧地，还有川流不息的行人，都被它收摄于内。黑色长墙如黑色镜廊，活着的人在流动，叠映在死者的姓名行列里，这就是生与死的对话。

另一种记忆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国家大了，什么人都有，其中最大的差异恐怕就是南方人与北方人的差异。中国如此，美国也是如此。1996 年初夏，我第一次去美国南方佐治亚州，那里正在举办奥运会，全中国的电视观众都在注视着这个州的首府亚特兰大。后来这个城因为对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接待规格不如国内习惯的那样高，以及另一些中国人不太习惯的问题，曾激起一部分留学生的愤怒。对于这些遥远的爱国主义——出国之后再爱国，我以后若有机会，会在这个栏目写一点不同看法，可能会让这些爱国同胞生气，甚至挥拳相向，有什么麻烦，到那时再说。这里先说当时亚特兰大留给我的印象。

这个城市不大，但似乎架子不小，它的居民不太欢迎在家门口举办奥运会，确实没有我们中国城市那样每到这个时候像孩子过年那样兴奋。我所生活的上海，比它大十倍，却比它更年轻，更容易被感动。不要说举办奥运会，就是举办一届本国的运动会，开幕那一天，全市职工也要尽可能放假，并停留家中，为的是让出尽可能多的车道，保证那几个踢球的健儿能准时进入某个特定的体育场；而全城所有的扩音设备这时都会尽可能打开，从电视机、收音机，直到楼底下居委会老妈妈的铁皮小喇叭，都要反复通知，要居民收听开幕式那激动人心的实况。亚特兰大的居民不知从哪儿来的那种架子，来这么多奥运健儿居然不待见，盛世大典还未开幕，他们就嫌烦，很多人举家外游，有意躲避这个热闹的日子。有个出租车司机就跟我抱怨说，奥运会还没有开始，他的生意就已经清淡下来了。

剩下的居民是否对外国来宾就拉下一副寡妇脸，冷眼相向？倒也不是。我曾在亚特兰大市郊的一个教堂里旁观他们的一次礼拜弥撒。例行的宗教内容结束后，那个西装笔挺的教士突然开始宣讲非宗教内容，说奥运会即将在我们这里举行，希望本社区的居民比平时更勤快地洒扫庭院，搞好环境卫生，你可以不喜欢运动员的粗鲁、没有文化，但不应该对外国来宾没有礼貌，要笑脸相迎，要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云云。这就有点像中国常见的号召人们学雷锋了，而且是真正的说教，就在教堂举行。只是有一点不同，在中国，这样的善意教导多半由单位负责人和居委会来反复进行，最后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而在亚特兰大，那些星期天进教堂穿得特别讲究的善男信女，听着那个西装革履的教士的说教，居然恭恭敬敬，一起跟着唱圣歌，真令我大开眼界。

那个教堂坐落在亚特兰大一座著名的山下，那座山是一块孤零零的巨石，拔地而起，就叫 Stone Mountain（石头山）。据说全世界只有两座这样的山，另一块在澳大利亚。当时中国电视台在播送奥运会的节目间歇，曾反复播送这座山的风景照片，以调节观众疲惫的视觉。因此，记性好的中国电视观众是应该还记得它的大致风貌的。如山上有缆车通道，缆车一上一下，会经过一座刻在山体上的巨大浮雕，浮雕上有三个人物，三人都挎着上一个世纪的老式手枪，骑着高头大马，等等。问题就出在这三个人物上，尤其是排在最前面的那一位，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叛军的总司令——李将军（General Robert E. Lee），按照 30 年前中国人的说法，是个历史反革命，按照 30 年后中国人的说法，至少也是一个历史罪人。这样的人物怎么能刻山纪念呢？不知是否出于中国记者正确的历史意识，或是相反，他们对眼前的历史画面毫无感觉，电视台的镜头无数次地经过这位李将军的雕像，却

没有一次向中国的电视观众说一句：“这就是在中国流行的小说《飘》中多次出现的南部叛军领袖李将军！”只消说这么一句，有意思的问题就来了：美国人怎么会纪念这么反动的南部头领？即使美国出版的历史书，只要说到南北战争，不也都是说北方代表着正义，南方代表着反动？难道在一个国家的内部，还允许被战败的一方保留着他们自己的记忆？

我在小学四年级时第一次登台演小剧，就是被满脸涂黑，化装成一个美国南部小黑奴，在台上高高举起镣铐，作英勇反抗状。40 年后我自己来到这块土地，居然发现在这块土地上高高耸立着的不是镣铐，而是代表着镣铐一方的李将军塑像，当然是目瞪口呆，不知说什么才好。然而，更为诧异的事还在后面。

我下得山来，坐小火车绕山一周，那也是风景区的一个旅游项目。小火车保留着 1861 年内战爆发时的蒸汽车头模样，还会“呜-呜”地拉响上一个世纪的蒸汽汽笛。铁路沿线是人工仿造的历史遗迹：一会是当年南军浴血奋战的战壕，一会是南军将士的宿营帐篷，全不见北军痕迹。小火车停在了终点站，装模作样地加水，喘粗气。我下车进入设在这里的南北战争纪念馆。馆里陈设先进，最吸引人的是一幅巨大的电子沙盘，有一个房间那么大。那上面山峦起伏，河流粼动，还有一排排红灯闪亮，演示着当时南军节节抵抗的战线，一排排绿灯闪亮，代表着北军侵入佐治亚州的路线。待观众围绕它坐定，解说词在脑后响起，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开始控诉：

> 万恶的北军进入我佐治亚家园，一路上烧杀掳掠，把盐撒入我们的庄稼地，使我们的土地寸草不长。他们的薛尔曼将军（General Sherman）厚颜无耻地说：“战争就是地狱（War ishell）”，是的，他把我们美丽的佐治亚活活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这不是我们经常控诉鬼子进村的语气吗？听到这样的解说词，每一个中国观众那会惊骇莫名，矫舌而不能下。要知道，这座纪念馆不是民间私人举办的，而是佐治亚州政府以公款设立，它的解说词岂不代表着州政府的官方立场？这样明目张胆的叛乱言论，居然存在一百多年每天要重播几十遍，联邦政府为什么不来取缔呢？

我后来沮丧地发现，如果按照我所习惯的逻辑，联邦政府有权来取缔，美国土地上可取缔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在南方，到处可见南军的纪念雕塑。如果坐“ 灰狗”（ Greyhoud）在乡间旅行，随时都可以看到一面飘扬着的南军旗帜就点缀在某一个美丽的农家院落，那面反动的旗帜上斜着交叉两个宽大的蓝杠，蓝杠里点缀着十几颗白星，一颗星代表着当时一个叛乱的南部州。一些旅游胜地的纪念品商店，橱窗里赫然陈列着南军的灰蓝色军装，柜台里出售各种南军留下的小玩意，如南军的刺刀，南军的军用皮带。甚至在大城市的街头，也可以看见一些后现代造型的小汽车后窗上，贴着一百多年前的南军军旗，招摇过世。朋友告诉我，在南部的很多小镇，还流行这样的娱乐：每到盛大节日，小伙子们最爱玩的军事游戏，是穿起爷爷的爷爷留下的军装，在战壕里与化装的北军再次开打。

甚至到了北方，也有同样的情况。我曾两次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葛提斯堡战场凭吊，那里发生过 1863 年南北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次决战，类似于我们的淮海战役。江泽民主席访美时曾引用过林肯总统在那里的著名演说，孙中山

将那篇演说中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精妙地翻译为“民有、民治、民享”三大原则，创下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一个由业余翻译创立的最为成功的典范。那个战场其大无比，方圆30公里，坐车在里面走马观花，粗粗转一圈需两个小时，如果是步行，旅游手册上建议你最好先在附近找个旅馆住下，然后准备两天时间细细游览。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无牛羊，大概只有老美才舍得拿出这么大一块肥沃土地，什么都不种，干干地撂着荒，只为了让后人满足一下凭吊古战场的好奇心。设想从蚌埠到宿县之间，我们也划出这么一块30公里方圆的战场遗迹，那将会引起多么严重的移民问题，承受多么严重的代价？

那个战场保留着当时双方军队对峙的所有工事，战壕、铁丝网、宿营地、指挥部，还有一排排的铜炮，就在路边排列。在北军战线这一端，有各州民间团体捐款建造的各式纪念性雕塑，因为地处宾州，当然以宾州人民建造的为多，也最为高大巍峨。有意思的是，各州建各州的，甚至区分至各县、各镇，而且大多选址在当时那个州、县、镇民兵团队驻扎宿营的老地方，上面尽可能详细地刻印着团队番号、上校姓名和战死者名单。那么，被打败的南方呢？他们在家乡能那样公开地纪念着他们的先驱，到了北方，尤其有美国革命圣地之称的宾夕法尼亚州，他们还敢那样放肆吗？从望远镜里看去，南军的阵地真的还在，隐隐一线，鬼影幢幢，似乎还埋伏着令人不安的杀机，随时都会万炮齐鸣，向这边发射排山倒海的炮弹。

我的朋友经不住我的固执，两次到这里，都要驱车开到对面去仔细地看一看。对面确实游客稀少，但纪念性雕塑一样多，一样巍峨耸立，也有几百门铜炮一字排开的炮兵阵地。与北方一样，南方人也是分各州、各县、各个小镇，寻找到他们当年子弟的永息之地，塑像立碑，刻上他们的团队番号、上校姓名、战死者名单。在所有的建筑中，果然以李将军的雕塑最为壮观。这一次他在这里就不是山体上的浮雕了，而是升一级，是一尊立马平川挥刀前进的全身铜像。那铜头怒马足有二层楼高，李将军就站在那么高的位置，抽出他那把西点军校赠予的指挥刀，指向我们刚刚过来的北军阵地，回头向他的南军阵地发出“fire！　fire！”的开火命令，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令人沮丧的是，在李将军坐骑的铁蹄下，我又看到了一面在南方经常看到的那种蓝叉白星旗帜，很小，却很鲜艳，就插在北方的雪地里，说不清是谦逊还是骄傲地飘扬着。从那面旗帜的鲜艳程度，我判断那个插旗的南方人不会早于三天前，刚刚离开这里。

我终于憋不住了。就在南军的炮兵阵地上，对我的朋友发出一连串的问题：

>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记忆版本？
> 究竟是北方对，南方错，还是相反，是南方对，北方错？
> 美国的历史如何撰写？难道一团乱麻，不置是非？

我的那两个朋友虽然是小贩，但毕竟写过《近距离看美国》、《总统是靠不住的》，最近又有一本《我也有一个梦想》。他们平静地回答：

> 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但是为什么不能有不同的记忆版本？
> 谁有权力来制定记忆版本？是政府吗？政府没有这个权力，它没有教育部，因此

也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是历史学家吗？他们可以各抒己见，但是同样没有权力规定一个统一的记忆版本。

谁是谁非也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谁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记忆版本。这才是南方之所以始终不同意北方的记忆，却再也没有冲动要第二次从北方分裂出去的关键原因。

我哑口无言。不幸的是，我恰好是那种以历史学为职业的人。此前我在中国教过 6 年中学、12 年大学，都是教那门叫作“History”的劳什子。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把“历史”叫作“他者的故事”（History），这样的说法虽然绕口，也许更符合“历史”的本来意义。

回想波士顿

回想波士顿，我两次去美国都住在那里，不热闹，不喧哗，60 万人口，只相当于中国一个地级市。它拥有 99 所大学，还有更多的博物馆、图书馆，依校园为生的人是那样多，以至你只要站在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街角，向任何一个方向看去，都会看到那种熟悉的神色，或是从这所校园出来，或是奔另一所校园而去。

我大概有 6 次路过纽约，或短期住几天，总是在还没有离开的时候，就提前烦躁起来。一回到波士顿，坐上从 South Station 始发的红线地铁，就有一种回归家园的感觉。南站已经 100 多年了，从这里经过的地铁线是在我们的光绪年间铺就的，比我们已经废置不用的老北站还要老旧。我喜欢它那柱廊式的罗马风格，更喜欢那些老地铁里的乘客，他们没有纽约地铁里的人那样匆忙喧闹，表情也平和，给人以安全感。至于洛杉矶，我只去过一次，是好莱坞大道上蜂拥而至的中国人，突然败坏了我的胃口。我到现在也弄不懂，把自己的脚套在那些电影明星留在水泥地上的脚印里，横一比划竖一比划，能比划出什么意思？第二次转机路过，可以停留一天，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有一次还接到一个从洛杉矶打来的电话，是在大陆艰难岁月里的好朋友。当年副食供应紧缺，一起在中原小县城里排队挤购过猪杂碎。我没有见过比他智商更高的人，但在当时，他的满腹经纶只能用在每次挤购出发前，从图纸上划出从哪一个角度挤进去，方符合最佳力学原理。后来他经一个姓杨的诺贝尔奖得主推荐出去，去美国西部受过很精深的研究生教育，留在洛杉矶开了一个很不错的小公司。我们的精神世界不幸有了一些裂痕，但是两人都珍惜过去挤购猪杂碎的友谊，相互克制着，标记。它们大概是要提醒我：

——别装蒜啦，老哥。且忘了下一站是耶鲁，是普林斯顿，遮不住你的中国底细；国家是白的，另一块是黑的，你只是从它们中间的灰色地带走出来的；写你那五花大绑，三寸金钥，以及那开信拆信、又封还失主的开封“贼”吧！

这就是埋在我皮肤下的声音了。有点像祖国医学的封闭埋穴，估计也是有中原土音在那里顽强诉说。而在我开头所说的那个恶业里，以老黑格尔说过的一句最为恶毒：你走吧，你走不出你的皮肤。我后来再也没有看到如此令人沮丧的判决，一句话就烙上一个中世纪式的火印，而且还看不到这一判决的尽头。我的文盲母亲说的“穷人生富嘴”，一点也不差，能和上一个世纪著名哲学家的名句配上对子。她使我一辈子战战兢兢，再也不敢追逐大学里的话语时髦。你走吧，你就是在脖子上系满领带，也走不出自己的皮肤，走不出这褐色标记。

（本文发表于《万象》杂志 1999 年第 4 期）

“娘希匹”和“省军级”
——“文革”读书记

1966年夏天，我小学毕业，却碰上取消升学考试，枯坐在家，静待分配。突然一个消息传来，激起小伙伴们一阵兴奋：郊县有一些质量上乘的学校，需动员一部分市区学生去住宿就读，分配到我们那里的是上海县宰庄中学和川沙县高桥中学。男生看中这一去向，是因为可以住宿，远离父母束缚，有一种远走高飞的感觉。几个心野的同学特别向往高桥中学地处海边，于是相互约定，要到海滩去过一种崭新的生活。当时北方来的红卫兵刚刚到上海，他们搅动社会秩序，市面上出现一种越出常轨的激动气氛，只要在公共汽车上发表演说，或者朗诵传单，司乘人员就不向他们收钱售票。我们利用这一机会，在公共汽车上打快板、念传单，一路免费，既去了高桥，又去了莘庄。实地比较的结果，好像还是莘庄中学好，因为那个学校从外面看去很雄伟，有一个高高耸立的跳伞塔。到了“文革”第二年，这一消息却沉寂下来，再也不见提起。1967年夏天，新成立的市革会教育组终于想起还有一届小学毕业生没有分配，于是就按街道划块，三下五除二，将几万名活蹦乱跳的小学生当成几万个没有生命的阿拉伯数字，很快就把它们打发完毕，一个个塞进了住家附近的中学，我的那些儿时伙伴就这样被强行拆散。以后当然还常见面，但渐行渐远，一次一次差距拉大，直到最后大家都觉得没劲，意兴阑珊，终于停止了来往。很多禀赋极好的伙伴，就被这种撵鸡撵鸭式的大呼隆分配耽误了。奇怪的是，那些资质较差的人，有幸进入一所好中学，不见得就能学好；而资质较好者被那些坏学校耽误，却很难逃过厄运，几乎是百发百中。

“文革”尽管乱，但是否重点中学，一进校门就能感觉得到。我后来养成一个令人讨厌的心理习惯，与老三届接触时，第一次交往总是情不自禁地揣度他的“中学门第”，而且分辨率还很高，能感觉得出30年前是“区重点”还是“市重点”毕业的细微差别。这种痕迹潜藏在人的语言举止里，使人想起列宁的一句名言：40岁以前的面容，归上帝负责，40岁以后的面容，归自己负责，只是在这里，需把40岁改成20岁就是了。只要有两个人站在你面前，让他们争论5分钟，多半就能听出，当初谁是市重点毕业，即使他目前下岗；另一个是从非重点毕业，即使他递着名片说：“北大毕业，专搞现外”。现外，现代外国哲学之简称，说快了会被误听成“现实”，一种很深奥的时髦学问。

我的命运一贯中庸，那时被分配进一所区重点。“文革”中武斗比较激烈的学校通常是两类：一类是没有高中的初级中学，因为“文革”前学习气氛就不好，又没有高中生引导，很快就由着那些孩子王胡闹。分配进这一类学校的人进门第一眼，能看见的就是那些穿着蓝色大翻领运动衫的“头头”，骑着抢来的自行车在操场上练车技。第二类虽是重点中学，而且还有很好的高中部，但临近附近的机关大院，特别是临近部队大院。1964年强调阶级路线，那些学校降格录取了很多干部子弟，尤其是军干子弟。分配进这类学校的人进门第一眼，能看见的是：现代八旗子弟穿的不是蓝色运动衫，而是洗得发白的黄军装，骑的不是自行车，而是摩托车，就在操场上狂奔。他们不说“摩托车”，而是说“电驴子”，当然也是抢来的。这些人在学校里挥着父辈的武装带耀武扬威，但内心还是有自卑。运动前多半成绩不佳，运动中也写不出有水平的大字报，知道学生中的大多数瞧不起他们，故而有很强的

报复情绪。我就听说过这样一则真实故事：有一个军干子弟，女的，追求班上的小白脸团支书，但成绩太差，连入团都被拒绝。“文革”一起，这群小姊妹就把那个小白脸吊起来一顿暴打，白天批判他资产阶级思想，“不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晚上则倾筐倒箧，骂出来的全是她们从父母大院里听来的肺腑之言。那位军干小姐就这样指着资产阶级出身的“梁上君子”，厉声骂曰：“老娘就是不夹你那二两肉！”我以后再也没有听到比此更为淋漓的骂语，哪怕是旁听夫妻对骂。如此绝妙好词，夹杂着暧暧昧昧的女人幽怨，让擅长此道的琼瑶听见，还不活活气死？一般港台小女生是想象不出来的，非长期浸染大院文化者不能办。此为衙内语，大院文化剥了皮以后的特产。似还保留有当年湖南农运之底气？但仅此还不够，必须进入新式大院再泡上权力汁液，农运之底气加权力之霸气，八旗者，霸气也，这才能酿出如此一坛好酒，“文革”脱轨，金瓶崩坏，琼浆飞溅，才让平民百姓惊闻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悦耳效果。“文革”一过，这些穿黄衣服的人，把打人丑行往一个抽象符号“造反派”一推，先出国，后经商，再不称心，还能加入第三梯队。而前面那些出身弄堂穿蓝色运动衫者，则多半在“文革”中期的“红色风暴”就已收入网内，或在“文革”后的“清查三种人”运动中被打入另册，拖得再晚，也躲不过 1983 年夏季那场雷厉风行的“严打”。“文革”中的这段历史很有意思，却始终不见有人触及。我后来碰巧学历史，就姑且把它称为“黄衫党俘获蓝衫党并将其捺为自己替身的历史”。①

我那所中学，先前叫麦伦，1949 年前是很有名的教会学校，50 年代因抗美援朝，更名为继光，60 年代又从市重点降为区重点，一蟹不如一蟹。所幸附近没有大院，尽管叫继光，但 60 年教会学校的底子一时还来不及败光，书比衙内多，气氛就比上述两类略好。我们进校时，校内红卫兵已实现大联合，秩序被高中部的学生控制，虽也有“牛鬼蛇神劳改队”，但也未见随便打人的现象。当时校内还有一届老初一，即六八届初中生没有分配，于是就把我们命名为“新初一”，称他们叫“老初一”，以示区别。高中部向“新初一”各班派出辅导员，十分虔诚地向我们宣讲原来的黑校史，以及“文革”这两年的红战史。我们对他们很崇拜，他们对我们却很羡慕，认为我们没有受到 17 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污染，比他们还要根正苗红。新初一进校时，校内红旗招展，像过节一样，似乎是翻开了教会中学的新一页。我至今还记得我们班的黑板两旁是一幅红色对联：“蓝天白云寄红心，生生死死为革命”，行草，笔力遒劲，超过现在的文科博士生普遍水平。我进校不久就贴出过一份长达 11 张白纸的大字报，谈教育革命尤其是语文教材的设想，题目是“给辅导员说几句心里话”。这大概是我有生以来发表的第一件作品，很快就被我班的辅导员看中。这位辅导员出身职员家庭，性格文静，既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又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使命感，对我着意引导，很快成为我的精神导师。

学校藏书有 4 万，这在当时的中学图书馆不是一个小数字。关键是 4 万藏书中，还有许多 1949 年前出版的老版本，就是这些被抛入垃圾堆的“禁书”，打开了我精神阅读史上的第一扇天窗。有一天，我寻找一个打飞掉的篮球，在图书馆墙边的垃圾堆中翻动，无意中发现有一大堆“四旧”，如解放前的地图之类。再翻检下去，竟是整摞整摞的竖排本旧书，有些还是烫金精装漆皮封面，不禁大喜过望，随即抱了一大摞回家。这些书中，我今日印象最深刻的是一本封面封底都已脱落的世界史教材，40 年代的翻译本。我好

奇地发现，早先知道的一些历史事件，原来都有另一种说法，甚至是相反的说法。例如十月革命，它竟然说：列宁是坐着德国人提供的火车，穿过德俄火线，回到彼得堡，这才有 11 月 7 日的事件，旁边即配印一幅列宁在十月的大脑袋肖像。当时看到这一段，我的小脑瓜子“轰”地一声，两眼发直，久久回不过神来。这本书成为我第一本私藏“秘本”，后来流传出去，被复兴中学一个高年级学生借去不还，我插队离城第一次回家探亲，还去追讨过，也没有要得回来。今天想来，我能说出那个赖帐者的姓名，却说不出那本书的著者姓名，就像回忆一个在茫茫人海中消失的旧友，肯定还活着，却不知在哪里漂浮，也是一痛。多年后我在工厂里开始自己的自学计划，为什么单单从世界史起步？当时意念很坚决，但动机并不清楚。直到此次被《上海文学》编辑逼着写这篇文章，搜肠刮肚打捞记忆，想起了这本书，才若有所悟。

“文革”中的书店，是否像现在的回忆录作者描写的那样，是清一色“红宝书”？也未必。即使是“红宝书”，也会翻出花样。我记得是 1967 年的冬季，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还在开张，就在今天的外文书店原址，但门面大得多，甚至有二楼。我那时已经有跑福州路“淘旧书”的习惯，那一天偶然在这家书店发现一张告示：订购英文版毛主席语录，每本定价 6 毛。我当时的零用钱父亲规定是 5 毛，包括剃头洗澡。花 6 毛钱定一本外文版毛主席语录，就有点像现在的人月收入 1000 元，以 1200 元买一张流行光盘，而且还不是现货，是期货，又看不懂，干不干？我当时在中学里学的英语无非是“long live，long long live”那一套，根本不可能培养起对外语的兴趣，按道理不会下这个单子。但到这个时候就显出前重点中学的好处：我有两个高年级的好朋友，一个在复兴中学初中部，一个在本校高中部，我在读书方面如有疑难，多半是请教他们，这一次也是如此。他们听说后，一致鼓励我买：你现在用不着，不等于你将来用不着，用这本英文版与中文版对着读，是自学英语的好读物。他们不仅鼓励我，甚至和我一起到福州路去填那个订购单。过了大约半年，书店果然把这本英文版小红书寄到我家，很守信用。这本书到手后，我只是出于好奇胡乱翻过一阵，并没有成为我学习英文的入门。不过，作为我第一次订购书籍的记录，而且居然是在“文革”中，有点滑稽，在此不妨提一笔。

顺便说一句，福州路上的旧书店那时有大量旧版本马、恩、列、斯著作，也有鲁迅全集及各种单行本，价格极便宜，品相也好。我记得那时 9 点开门，8 点半左右，门口开始有书生模样的人聚集，门一开，就冲进去抢购自己早就等待的书籍。我那时都是步行去，来回约一个半小时，坐电车钱不过一毛四分，却舍不得，因为这一毛四分可能就是一本好书的价钱。我现在书橱里的一些左派经典，大部分就采自那一廉价时期。

“文革”中也有一些禁书悄悄流传。我就是因为读这些禁书，终于读出一场大祸。当时从高中生那里流出一套《金陵春梦》，我好不容易排队等到，读完后，就记住一句作者编排蒋介石的那句口头禅：“娘希匹！”那天下午，我从福州路回来，径直回校，教室里有几个同学在讲台上用毛笔乱涂乱抹。他们走后，我走上前去，拿起那支毛笔，随手就写了个“娘希匹”，而且还加了个“！”，写完即扔，扬长而去。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前面那些同学写的是什么，而且正好也被我写字的那个胳膊肘压着。第二天早上进校，即发现气氛异常，早操也不出了，却有公安人员的神秘身影。走到自己的教室，就听有同学在嚷：“不得了啦，我们教室里有反动标语，有人在讲台上写了‘娘

希匹，毛主席万岁！’那张讲台已经被抬到保卫处去了。”这一听，如五雷轰顶，我跌坐在地上，后面还有什么就听不见了。原来昨天下午胳膊肘压着的，竟是那要命的“毛主席万岁！”朱学勤啊，朱学勤，这一回你算彻底玩完了！

我去找那个比我年长两岁的67届朋友商量。他那时虔信马列，听我说完实情，头一昂，很自信地说了一句毛主席语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鼓励我去找工宣队、公安人员说明情况，没什么大不了。我也就忐忑不安地去了。不料那些人听后十分意外，相互交换眼色，一个劲地眨眼睛。原来我经辅导员推荐，已经是工宣队培养的对象，新初一红卫兵连的“连长”，管12个班，600多人。他们正按照学生的家庭出身排队摸线索，绝没有怀疑到我头上。现在已经宣布这是反革命案件，能因为是我所写就撤销这一案子吗？真是骑虎难下。恰好又进入“清理阶级队伍”的严峻时期，同一年级另一班一个小同学据说也是因为书写反动标语，公安局开着吉普车大白天进校抓人，气氛非常恐怖。公安局、工宣队和校保卫处只能专门为我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先宣布撤销我的职务，然后内查外调，进进出出，忙得不亦乐乎。我则猫在小屋里，灰溜溜地面对他们的反复盘问，一遍一遍地写检讨。工宣队态度严厉，但不难缠，最难对付的是参加专案组的那个男教师。他与我的班主任正在谈恋爱，而我此前不满意那个班主任忙于恋爱疏于备课，上语文课讲不出多少东西，曾对她提出意见，这一下逮个正着，两个人一明一暗，合起来整我。其实工宣队也已看出这一案子属偶然笔误，但碍于形势，无法正面阻止那个男教师。那人最感兴趣的是《金陵春梦》从何而来，反复问我书在哪里，必须没收，以防扩散，其实是他自己想看。人到此时，要什么给什么，但总不能把那个借我书的高中同学卖出去。那一时节，我最头疼的就是他最后这一问题。这个案子后来定性为“敌情内处”，即“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按当时标准，留住我不进班房，已经算宽大无边。但我不是反革命，也有反革命嫌疑，剩下的两年岁月如何度过，也就可以想象了。事发后，全家笼罩着一种殡仪馆气氛，就像刚死过人一样。父亲当时在单位里也有运动压力，闻讯大怒，认为全是我爱读旧书之过，将我的一个书箱撬开，一本一本全撕了。

“娘希匹”事件后，我成了一个小牛鬼蛇神，成天抬不起头，终于知道了那时整天朗诵的鲁迅诗词“破帽遮颜过闹市”是什么滋味。但私下里也得到过一些温暖。一个是前面提到的辅导员李敏，当时是她在新初一进校不久发现了我这个苗子，推荐我做了那个劳什子“连长”，不料却是个闯祸坯子，惹事的孽种。出事后，她曾在“体兰”馆前的那块草地上找我谈话，鼓励我不要一蹶不振，自己却边说边流泪。她的恋爱对象是高二（1）班的同班同学邱洪琪，校内大联合以后的红卫兵团长，人也正派。每有集会或游行，他总是扛着校旗走在第一个，让路人看得眼睛发亮，可见其英俊漂亮。李敏大概找过邱洪琪交过底，要他抵制那个男教师对我的逼迫，否则以我当时之幼稚，实在顶不住那个人索书逼书的压力。我离开上海后，时常想念这位善良的辅导员，13年后返沪，费了很多周折，终于找到他们夫妇。②另一个助我过关者只能是暗中出力了，而且是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时的工宣队队长，恰好也姓蒋，人称“蒋师傅”，黑脸膛，微胖。我毕业时要做政审结论，他为此事到我父亲单位翻阅档案，发现父亲是他50年代就已认识的朋友，于是发恻隐之心，不知通过什么办法，居然在我的档案里抽去了这段祸事的材料。

我多少年提心吊胆，小小年纪就有“历史问题”，档案里记有一笔，如影随形。1972 年在插队的地方招工，发现招工干部没有追问此事，却在远兜远转地套问家族里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海外关系，心里好生奇怪。当上工人后第一年回沪探亲，父亲才说出这一段真相。工宣队换过好几茬，我后来再也找不到这位“蒋师傅”。他肯定已经退休，虽躲过了下岗这一关，但是“文革”做过工宣队的经历是否会给他的后来生活投下阴影？即使没有，退休之后的晚年生计多半艰辛，哪会有闲心到《上海文学》这种地方，来翻阅无聊文章呢？恐怕是再也见不到他了。我自己离开上海后，爱读旧书、禁书的兴趣依旧，但一听到“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就害怕，也落下了一块心病。

1972 年 10 月，我结束插队生活，进入豫西山区的一个化工厂。仗着年轻，白天扛一天的重型管道，晚上却还有精力在灯下自修，先读历史，后读哲学。此时上海出版了 4 份杂志：《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自然科学版和社会科学版。虽然也是左，但比两报一刊好看，相信同年龄的人都还记得。这 4 份杂志，父亲总是定期寄到我生活的地方，引起周围同道者的羡慕。后两种杂志，今天我还保存得很好。到了 1974 年前后，毛泽东批示重印一些文革前的“灰皮书”，并组织翻译苏联及西方最新的小说、政治理论书籍。毛泽东为何要印发这批书？这是一个谜，谜底至今还未打破。当时能够说出的理由，似乎是有一条最高指示，为了抵制“形而上学猖獗”？但客观效果却不是他在紫禁城深处一个人能够预料的。就像他当时大笔一挥，批示全党传达林立果恶毒攻击他为 B52 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证明其自信，人民不会听信这些“恶毒攻击”，但传达以后的效果则恰恰相反。多少年后我问同代人促其觉醒的读物是什么，60%的人居然会回忆起这份“五七一工程纪要”！在精神干涸而又弥漫着怀疑不满的年月里，重印那些灰皮书，还要组织翻译西方 70 年代的最新理论著作,无异于在遍布干草的荒原上撒上一把火种。他老人家总爱播火玩火，回回都是赢家。但 1974 年那一把，大概也是他最后玩的一把，从效果看，肯定是玩砸了。火种一旦播下，能保证它只顺着指定的路径燃烧，而不会掉过头来先反噬他自己？我后来始终认为，80 年代点燃新启蒙思想运动的火种，其中一部分火星，就是从 1974 年那批“内部书籍”悄悄阴燃过来的。我总是在猜测毛泽东临终前夕的心理状态，却百思不得其解。无论是伟人，还是大众，曾经有过的心理波动大概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幽暗深处。而且是最先消失，再也难以复原了。就我而言，只能庆幸自己在那一年月能较早读到那两批读物。这真是一种幸运，如果没有这两批读物，我的启蒙始点可能要向后推迟 5 年，甚至更晚。后一批书的译者，署名统一为“上海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其实都是文革前的老专家、老教授。我也时常猜测这些匿名译者当时是在什么心情下翻译的？肯定会有一种满足，是仅仅为能发挥一技之长而感激涕零，还是有一种边翻译边盗火的窃喜？也许还是以前者为多，后者即使有，也是极为朦胧，而且也正在历史的暗处慢慢消失。这些前辈有些还健在，趁他们记忆力尚未全部丧失，抢救一些历史细节，哪怕是一些朦胧的心理细节，也有助于改变目前“文革”回忆录千人一面，面面可憎的蹩脚相。我在下面只能再补充一个细节，也是现在那种连环画式的文革记述者没有注意到的。文革期间全国图书馆都停止购买西方期刊和原版书 ，但上海图书馆例外。这一秘密是我在 80 年代初为做硕士论文北京图书馆调阅过时期刊，无意中发现的。我问那里的管理员为

什么堂堂北图，居然没有六七十年代的杂志，那个管理员没好气地回答：“你不是上海人吗？你到上图去！‘文革’期间，只有你们的上海图书馆没有停止进口外文期刊！”

毛泽东批准的那两批禁书，就在福州路上的“上海书店”出售书店二楼有一个“内部书籍供销柜台”，凭“县团级”与“地师级”介绍信分级别配售。令人向往的是，“内部”还有“内部”，里面还有一个柜台，凭“省军级”介绍信才能进去，专供最“反动”的书籍，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我当时为了搞到最里面的那批书，尤其是那本耳闻已久的《美国与中国》，真是动足了脑筋。一张县团级介绍信能购买的范围，已经不过瘾，到哪里去搞一张“省军级”介绍信呢？真是天不绝读书路，我后来曲曲折折，关系托关系，竟然就搞到了这么一张。

我那个车间的政治指导员叫崔清汶，解放初期毕业于河南银行中专，人如其名，有书卷气。老崔与我私下交谈，认为我还有点思想，于是又像辅导员那样，着意引导。他后来曾推荐我上工农兵大学，未果，但无意中帮我一个小忙，使我受惠至今。他的一个好友姓李，时任厂革委会办公室主任，管大印。老李又有一个朋友，当时在省委宣传部给部长当秘书，管着一个更大的印。我知道这一线索后，先说动老崔，再让他说服老李，给我开一张厂革会介绍信致河南省委宣传部，到那里再换开一封介绍信致“上海书店”，不为别的，只是想探亲回沪时多买点书回来。那时的人并不像后来人回忆的那样见书就扔，相反，私下还是喜欢爱读书肯思考的人，当时叫“爱学习”。老崔、老李就属于这样的人，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所在的厂是“地师级”，也刚够给“省军级”单位开信。但介绍信是格式化的，只填一个对方单位和被介绍人姓名，“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兹介绍我厂朱学勤同志前往贵部联系工作”，至于联系什么工作，那就全凭你自己去说了。

我坐火车去郑州，在污浊的车厢里和农民兄弟挤来挤去，终于想好了一套说辞。一到省委宣传部，老崔朋友的朋友，即老李的朋友，是个中年女秘书，面相不恶。我说：“我们厂里成立了批林批孔写作组，我是写作组成员，现在急需一批内部参考书籍，我可以回上海采购，请部里支持。”那个女秘书原籍是我那个厂所在的巩县，见家乡来人，就有几分亲，又听我说是老李介绍过来的，更无疑意。只是说：“换部里的介绍信，要经过部长的批准，让我进去说说看。”这一关却是我不曾想到的，女秘书一进去，我心里就开始打鼓。这一次可真是有点害怕了！为了读“禁书”，我冒的风险越来越大，这一次可能闯出更大的纰漏。那个部长只消向厂里打个电话，就会拆穿我有关写作组的谎言，5 分钟后，我就得低头认罪，那就比我少年时代的“敌情内处”严重多了。女秘书在里面大概也只有 5 分钟，我却觉得有 1 个小时，如坐针毡，甚至想不告而别，悄悄逃走。谢天谢地！我这边已经开始后悔，那一边女秘书已经说服部长，一脸轻松地出来换开介绍信了。

我揣着那张“省军级”介绍信回上海，如获至宝。先找到那个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朋友，两人欢喜不尽；然后分头去打听，福州路那家书店最近新上架有哪些书，抄成一张总书目，争取一网打尽。在介绍信有效期的最后一天，我们俩穿上深藏青呢制中山装，左上口袋尽可能多插几支钢笔，学出一副写作组成员的派头，作“省军级”状，直奔福州路二楼最里面那一间。出来接待的是个男营业员，一张精明的白脸，双臂还套着那个年代常见的书店职员的蓝色袖套，动作十分麻利。他看了介绍信以及需采

购的书目，竟未生疑，立刻从书架上抽书，一本一本配起来。我心忖：那份书目其实很容易露出破绽，是我们用钢笔在 500 格的大稿纸上一本一本手写的，只要多转一个念头，他就会看出那份书目的寒酸相，一个省军级机关应该配有打字机，怎么会使用如此简陋的手写书目？我后来分析那位营业员的善意，是出于对离沪知青的同情。当时每个城市的每个家庭几乎都摊上一个知青子女，知青进了厂，只要你还未回城，在城里人看来还是知青。回到生身城市办事，说一句“我是插队离开的”，多半能得善意帮助。当然，也可以做更深刻的设想，那就是人家已经识破我们，只是心照不宣，不说而已。

那位可敬可爱的营业员配完书后，居然说还有一些好书，我们书目上没有列入：“喏，格（这）本书老吃香，伊（那）本书在外头勿要想搞到！”神态得意，语气热忱，哪里像执行严肃政治任务，按级别严格配售“反动书籍”？活脱脱是上海滩“老迪克”在商言商，四马路旧书业难耐技痒，推销起他们的紧俏商品了！此前我没有听说，此后证明对我帮助很大的两套书，就是经那位营业员的热情推销买下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学术资料选》16 本，《苏联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23 本，尤其是前者，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文革前版本，翻译之精良，远远超过 80 年代西学热中我同辈人的那些粗制滥造产品。其中有：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悉尼·胡克《含糊的历史遗产》、《马克思在林苑》等，都成了我后来书房里的爱物。前年我为批评文化决定论，给《南方周末》写评论，题目定为“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有朋友问：“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促狭的一句话？”哪里是我能想出来的？它就来自悉尼一胡克《含糊的历史遗产》。胡克当年是以这句话总结他对历史决定论的厌恶，当时读到那一段，如醍醐灌顶，数十年不敢忘。以后看到决定论历史观改头换面反复出现，总会想起这句直截了当的大白话，心里暗暗好笑。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前看的一本旧书，到本世纪末用来反对知识界流行的文化决定论，不大不小，刚好凑手，这是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的。

1974 年冬天福州路上那次“省军级”购书行动，是我购书史上收获最大的一次。总共 300 多元人民币，花去了一个管道工整整 1 年工资。捆起来共 4 大摞，两人 4 臂，必须高高提起，才能离地。口袋里剩下的几个分币，只够两个穷酸的“省军级写作组成员”乘 17 路电车回家。在那次购得的书中，除了悉尼·胡克的两本，最称心的当然还有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1982 年这本书随我去读研究生，因为传阅过多，已经破损不堪。我与校内一个老装订工很谈得来，师傅帮我重新切边，夹硬版封面，书名还烫成金字，一本破书顿时焕然一新。又过了很多年，我到哈佛做访问，一抬头，隔窗就是费正清研究中心，近得令我吃惊。闲暇时，我也偷偷进去溜达过几次，都是一些不能攀谈的外国陌生人。我想找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只有一幅照片迎客。这个叫做“费正清”的老头，怕是永远不会知道在他关心的中国，多年前发生过一起与他有关的渺小的故事了。

（本文发表于《上海文学》1999 年 4 月号）

注释：

①这里应顺便交代，我之所以迟迟不能接受王朔的小说，也难以同意将其评论为平民文学、后现代试验、意识形态的有效瓦解或阳光灿烂的日子，就与我“文革”中的这段记忆过于深刻有关。后来，我也有幸

落入过那种大院，穿过几年那种颜色的衣服，感同身受，则更难纠正这种偏见。

②令人不解的是，我后来回母校参现校史展览，翻阅名人名录，独独没有这一代人的身影。据说其它学校也有类似情况。空白处，当有一段各方都觉寒心的记录？

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谈谈文化决定论

辞旧迎新之际，我想表达这样一个愿望，新的一年里，能否让我们多谈点问题，少谈点文化？

酒杯里面有文化，筷子头上有文化，直至厕所不干净，也有厕所文化，所有的弊病都可以归咎于文化，文化至上，文化决定一切，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文化决定论发展到这一境地，已经到了令人同情的地步。所谓同情，实在是因为话语空间狭窄，除了文化以外，再也没有多少深刻一点的话题可以谈论。作为一种语言策略，始作俑者可能心里还明白，谁知跟进者日众，众人齐声呐喊，就变成假戏真唱，将具体体制的具体病症，统统指向一种既深刻又总体概括的“文化根源”，非改造文化不能奏效。

文化既然被说成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张嘴就能呼吸，那就是第二大气层了。大气层怎么能改造呢？文化批判自我放大，慷慨激昂，只不过发动了一种空气与另一种空气的战争。清风逐流云，比唐·吉诃德都不如，唐·吉诃德前面还有一辆具体的风车。实在没有话题可说，那就不如沉默，沉默总比自欺强，文化批判走到今天，还有什么批判锋芒可言？一场荆轲刺孔子的闹剧，拖拖拉拉十几年，早该收场了。

从逻辑上说，文化决定论的判断由前后两项组成：前项是将文化夸大到网罗一切的程度，后项则夸口能改造这一因素。这样的前后两项恰好自我矛盾。从前项看后项，既然能决定一切，那么这被决定了的一切就包含那个改造者，改造者本身处于被决定状态，如何改造决定者？从后项看前项，既然能改造，那么被改造的就不能决定一切，至少留有一个空缺，它不能形成一个无所不包的“决定一切”。换句话说，文化决定论如果把自己的逻辑前项贯彻到底，那就可能推出一个宿命论，放弃改造文化的宏愿；如果偏爱自己的逻辑后项，那就可能推出一个唯意志论，至少要放弃逻辑前项，再不说文化能决定一切的大话。事实上，以往出现过的唯物决定论，也存在这样一种宿命论与唯意志论之间的矛盾和内在矛盾，只不过是用反映论再加能动论的诡辩，掩盖了宿命论与唯意志论之间的矛盾和任意转换。其实，只要是决定论，无论它是以什么来决定，都可以在宿命论与唯意志论之间任意转换，却不顾其间的自我矛盾。文化决定论是唯物决定论的变种，都属于历史决定论这一大家族。用文化决定论来代替唯物决定论，只是在历史决定论的家族内部兜了一个圈子。历史决定论在我们这里并不贫困，它经常从门口抛出，变个脸，又从窗口绕了进来。

从常识上说，文化批判越深刻，也越违背常理。追究一事物的原因，如果不适可而止，那就会开启此事物原因的稀释过程。原因挖得越深，距离该事物就越远，与其他事物之原因的联系就越近，特定事物的原因分子随深入程度而稀释，直至稀释为零。当你好不容易摸到“原因链的终结一环”时，特定事物的原因分子可能已经稀释殆尽，你手里的那一节“最终原因”可能已经越过临界点，正在将你导入另一事物的原因域。这种病态的深刻癖，是生活在观念世界里的知识分子经常容易犯的毛病。

有一个比喻，说街上有一酗酒肇事的司机，被一个深刻的警察抓住，他不去抓这个司机本身，却听信辩护律师的深刻辩解，去追捕酒店老板、追捕酿酒的厂商、直至追捕一千年前第一个发明酿酒的人。这个比喻出自悉尼·胡

克《含糊的历史遗产》。20 年前读此书，这一比喻给我留下鲜明的印象。此外还有一句大白话，很常识，却很扫兴，悉尼·胡克说：“ 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

（本文初次发表于《南方周末·学者论坛》1997 年 1 月 17 日）

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

有些事情是不能说破的，一说破，大家都觉无趣。比如说，这十几年里，越说越煞有其事的“文化问题”。“文化问题”在 80 年代叫“文化热”，在 90 年代叫“文化批判”，几乎呈可大可久之势。

之所以出现这一局面，原因多多。其中之一，大陆知识阶层是否存在一个文人过剩的问题？文人的思维特征是瞧不起工匠式技术思维，有问题喜欢向上走，走向云端，引出一个统摄一切的本源，然后再俯瞰下来，向下作哲学的批判或文学的抒情。这种文学化的哲学或哲学化的文学，构成大陆人文学科的先验氛围，而不是经验氛围，使得这一行当中人的思维方式迟迟不能向下着陆，挣脱中古束缚；而工匠式的经验性思维就比较笨拙，总是贴着地面步行，就事论事，局部问题局部解决，甚至是技术性地解决，轻易不敢把很多不相关的问题搅在一个大局里，然后发一通宏观议论了事。文人传统过甚，又喜欢追寻万物一源，就容易把这个“一源”定位在文人所熟悉的事务上，小如语言文字，大如文化方式，总得与“文”有缘，这样，他们从大学中文系学得的文化评论（多半是文艺评论），以及由此形成的抒情训练就统统派上了用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否因为允许讨论的问题实在太少？那么多人挤在这么狭小的言论空间，是因为再也没有一个话题像“文化”这样本身宽泛无边，同时又可以被讨论，必要时还可以被批判。这样一来，可就苦了“文化”，万喙啄一，啄得体无完肤，身上涂满各种文化人的口涎，不说臭不可闻，至少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了。

以上两个原因，轻易不能说破。尤其是后面一个，一说破，大家脸上都挂不住,那么一个高尚的文化形而上,竟然还有这样一个形而下的安全考虑？

世界历史上可能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要让“文化”承担那么多的东西。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既有经济的，又有政治的，既有社会的，又有个人的，文化说多了，就出来两派：西化派认为传统文化不改造，科学无望，民主无望；儒化派认为，科学也好，民主也罢，都要从传统文化里往外“开”，不要说四个现代化，就是那第五个现代化也可以而且是只能从传统文化里“开”出来。

我始终不能接受这个“开”字，无论是从西方文化里“开”，还是从中国文化里“开”。

我们是否先想一下文化究竟有没有那种决定性力量？我的看法是，没有。文化、政治、经济这三大块，各自有不同的发生机制，如果硬要说哪个与哪个接近，我只能说政治这一块离经济近，离文化最远。与其说政治体制是从文化里“开”出来的，不如说是从经济里“长”出来的（当然不能离开人在制度层面的努力）；与其说政治体制是文人议论出来的，不如说是与文人习惯距离最远的律师或相当于律师的人讨价还价锱铢必较“抠”出来的，此其一。其二，一种文化并不必然地只能与一种政治、经济模式配合，而是呈开放性多种可能：在文化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既可忍受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模式，也可接受另一种更为合理的政治经济模式，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不存在那种一旦文化如此，政治与经济只能如此，倘若变动政治经济如彼，先要文化改造成如彼的决定论闭锁关系。东亚如台湾等地基本是儒家文化，却出现与大陆不同的制度走向，已经说明了这一问题。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现代转型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关在书斋里搞文化工程设计，从“文化”

里“开”出来的。沉溺于文化讨论，只能说明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面对另外两大板块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偷懒、无能与无奈。仅仅是偷懒、无能与无奈，倒也罢了，可悲的是，失败以后还要把比自己强横的一方说成是被自己所从事的文化决定着的被决定者，自己的躲避是对被决定者的高迈超越，是“深挖洞，广积粮”，是为未来的根本变动“建设”更为“深刻”的“基础”。这不是典型的精神胜利法，又是什么？城里人说阿Q说了将近80年，其实，阿Q历来出在城里的知识界，而不是农村里的农民。

再进一步，还可以想一下世上究竟有没有可以决定一切的东西，管它是叫“文化”还是别的东西？从思想方法说，西化派，还是儒化派，两种看法表面对立，但在内里却是共通的。他们都相信有一种世界图式，在这种世界图式后面，藏着一个决定性的主宰因素，这个主宰因素制约着世界图式的每一个重大笔划，规范着世界图式的最终走向。这个主宰很久以前叫“上帝”，后来叫“历史理性”，在最接近我们的那一段行程里突然被改名为“经济”，由于“经济”这一字眼过于粗俗以及它后来在某些地方遭到了臭名昭著的失败，一部分学者嫌其不雅，于是约定俗成，又把这个决定者改名为“文化”。所以，西化也好，儒化也罢，表面吵得凶，其实都是决定论，只是以“文化”替代了“经济”、“历史理性”与“上帝”。两派人以对立的方式互相补充，都从对立的两端向当中那个双方看中的地方挤，一定要挤出一个文化决定论才善罢甘休。在文化决定论者眼里，文化问题没有最终解决以前，所有的社会改革都是不彻底的、没深度的，是盲人摸象；不讨论文化，而讨论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就像一群没有文化的工匠，在工程师没有交给他们图纸以前就草率开工，太可笑也太可怜了。

我不这么看。第一，我不相信有那个世界图式的存在。第二，更不相信文人手里摆弄的那一点文化，就是那个世界图式后面的决定性主宰因素。有一次，一个编辑在电话里非让我在文章名字后面注明职称之类的文化身份，我实在心烦，就随口报了一个“前管道工”职称。我以前是做过管道工，而且不止三五年，告别那一行当进入所谓的文化界，也还是甘心做一个“不彻底”、“没深度”、“没文化的工匠”。我和他们的区别在于，他们认为除了文化，其它东西都不值得改造，而我的看法相反，其它东西都可以成为改革的对象，惟有文化除外。被人们称作“文化”的那样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太大而且太空，始终在我们的身后，人们向前伸出无数双手，试图抓住它，每一双手抓回来却都是空的。文化确实像空气，人们每天都在呼吸它，却无从把握它。因此我始终弄不懂，人们怎么能向空气宣战，有什么必要向空气宣战？如果确实有某种主体宣称他能改造文化，而且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重建了一种新文化或摧毁了一种旧文化，那么他非神即兽，肯定不是人能干的事业。就思想史范围说，我近年来产生一个怀疑，难以释怀：从严复、胡适以来的文化讨论，很可能是个百年假问题？不能说毫无所见，但相比更应该着手的实际问题，那几代精英耗费于文化辩论的精力，实在得不偿失。300 年前黄宗羲说“有治法方有治人”，表面看来不深刻，缺乏哲理深度，属常识性思维，实际上是壁立千仞，顶破了几千年中国文人的习惯思维。他已经摸到了今天只有制度学派才摸到的一个关键点：制度本身能释放出强大的学习功能，能使整个社会行为模式卷入其中而不自觉。可惜这一突破性想法，太不合喜弄文艺、文化的中国文人的习性。到近代，在治法层面稍有挫折，就被胡适等改成“先有治人再有治法”，实际是先有“治‘文’再有治

法”，去搞文化改造去了。后经丁文江斥责：不要上胡适之的当，他才有所悔悟。到了我们这一代手里，文化问题则弄得更不像样，在知识积累上没有超过前人，反而形成一种伪深刻的风气，什么事都得往文化上扯，不扯就显得没学问。前辈学者陷于这一“文化问题”，既有上述思想方法的严肃原因，也有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使然，值得认真总结。我们这一代继续扩大这一“问题”，恐怕还有一个在当下环境中产生的形而下的心理动机？多半人当然不自觉，但是不自觉的力量超过自觉的力量，形成集体无意识，更厉害。在这一集体无意识的作用下，大家都把只允许讨论的问题冒充成必须讨论的问题，而且是决定一切的问题，越说越假，越假越当真，终于弄出一个“现实中不可承受之轻”，呈现一种内里萎缩外延肥大的文化痴肥症。戈培尔说，谣言重复千遍，自会成真理。他没有想到，文化问题重复十几年，居然也能成真理。这样一个可气又可笑的局面，大概只有等着童言无忌来解救了。恐怕是会有一天有一个不知轻重的孩子出来，冒叫一声“啊，皇帝身上没有穿新衣”，这个可怜的用泡沫塑料吹成的文化大气球才会“嘭”地一声彻底爆裂。

说到法兰克福学派，很可能是这些年“文化决定论”的一个洋根源。因为仅从学理符号看，这一派人以“文化批判”见长，似乎比他们的上几代人深刻，超越了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在诸种结构之下，打出了一口文化批判的深水井。在中国那些好谈文化问题的朋友眼里，能以法兰克福符号谈文化，自然比只会引用先秦古籍的人来得高雅而且时髦，又深刻了一层。

我写过一篇《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试图说明任何一种决定论，包括文化决定论在内，推理越深刻，越违背起码的逻辑。现在想来，对文化决定论者，仅仅在逻辑说是不够的，还应该认真对待他们的每一个论据；仅仅反对本土出现的文化决定论也是不够的，还应该认真对待他们从外面搬来的洋根源。对那些喜欢引用舶来学理而不是中国古籍谈论文化问题的朋友，似乎有必要破一破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迷信。事实上，这十几年从外面引进的洋思潮，像法兰克福学派这样，拿来就用，用之不衰，跟进者日众，却始终没有受到与之平等的学术检验，确实罕见。这件工作早就该做，现在有《读书》杂志来做，当然是好事，但也晚了一点。

我以为，法兰克福过来的这幅油画再深刻，也先不忙赞叹这幅画的内部结构。不妨退一步，设法获得一个广角视野，看看这幅画所在的西方批判理论发展史，究竟是出于上升通道，还是下降通道？

站远一点看 200 年欧洲社会冲突史，以法国为代表，可以看出一条社会冲突的下降通道。下降通道的第一阶段是经济冲突，从早期工人毁坏机器到 1789 年攻占巴士底狱；第二阶段是政治冲突，从 1793 年雅各宾专政设置断头台到 1871 年蒙马特尔高地起义；第三阶段是文化冲突，从上世纪中叶波特莱尔《恶之花》至 1968 年学生造反 5 月风暴失败。19 世纪以来的批判理论经历几代人的变化，是在这条下降通道中划出了一条批判理论发展史的轨迹，它可以上下踢腾，但无法突破制约它的向下轨道的限制。

面对这根下降线，也有一些思想家力图作出向上的解释，葛兰西在监狱里构思文化批判，即认为向资本社会争夺文化霸权，要比马克思当年的政治经济批判还要厉害，已经抵临与资本控制的总决战。而我以为，对立一方在骂声中成长，从批判中吸取营养，底部逐渐抬高，走出了 19 世纪的百年大底，

终于走上了一条逐级攀升的上行通道。这条被批判者的上行通道，与上述下降通道和下降通道中的批判理论，对位而立，是不能否定的基本事实。我们可以同情走下坡路的一方，从经济批判到政治批判，再到文化批判，说是矛盾继续存在，只是解决矛盾的战场一次接一次转移。但是，上述基本事实不能否认：矛盾是按照有利于对方的方式解决，战场是按照对方限定的路径转移。我对葛兰西充满敬意，同情心也在批判者这一边，但是他有点一厢情愿。我确实欣赏对方的顽强，欣赏对方的上行通道走得漂亮，也承认自己一方的被动，实在是一浪低于一浪。

1968 年学生从街垒撤退，标示着法兰克福文化批判由盛转衰，也标示着 1789～1968 年近 200 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西方已经成为过去。此后法兰克福人还在说文化批判，那已经是撤退以后撒在街上的一串删节号，虽有余韵，但更多的是无奈，那是龚自珍所喻：将萎之花，惨于槁木。今天来回顾这段历史，令人叹息的只是：上代批判者多有革命气质，恩格斯还直接参加过巷战，到法兰克福一代，批判再激烈，也只是在书斋里撒豆成兵，关起门来指点江山，自我称雄。法兰克福人至今还在说他们是马克思的遥远后裔，但他们也该想一想，老祖宗是被法国警察驱逐出境的，而新后裔的胸前却挂满了法国政府奖赏的学术勋章，这两者之间，有着多么令人难堪的差异？我的比喻可能粗俗：前者是配以工人运动的铁锤，猛击资本结构的头盖骨，而后者只不过是拿起知识分析的绣花针，戳戳资本结构的下腹部。重锤与头盖骨，不失为一种危险的关系，重量级对重量级，故而 19 世纪的历史远比 20 世纪精彩；以针尖戳戳下腹部，尽管被知识分子解释得玄妙，以至说是打出了一口深水井，比比马克思当年，实在是一种在学院中进行的知识谱系考古游戏，最危险的关系都已经释放。那口深水井，恐怕是避开岩层，打在流沙层上，是否有甘泉流出，总是面目可疑。你可以说是针刺，刺得真深呵；也可以说是在隔“腹”穿刺，针刺太短，已经够不着文化脂肪下的膏盲地段。脂肪太厚，批判苦短，那样的针刺，与其说是批判，又何如说是在文化脂肪上搔痒，甚至干脆说是在文化脂肪上跳舞，与资本结构远距离调情？

如果让我来寻找文化批判理论在西方社会冲突史上的地位，只能到比马克思、赫尔岑等人更下面的一段行程去摸索。从资本结构的头部一点一点往下摸，一直摸到那块柔软的下腹部，摸到那一大块文化脂肪，最后才会摸到在文化脂肪上打井的那几个针尖人物。在这些人物中，也有我喜欢的人物，如哈贝马斯。他能拒绝马尔库塞的“大拒绝”，还真需要一点保守主义的胆识。他谈出一番与西方社会主体结构交往沟通的道理，我不一定接受，但至少看出他有承认失败的勇气，没有把大失败说成大迂回，更没有把大溃退说成是深层掘进下的深度爆破，没有洋阿 Q。

沉痛一点说，塞纳河左岸来的左翼批判，一阵接一阵，已有 200 年。先是经济批判，后是政治批判，现在又是文化批判，只有一样不变，那就是：它们都是失败的记录，一串失败的记录缀成一根历史的下降线。这条路线的坡度是向下，而不是向上，是撤退，而不是进攻，是无奈，而不是深刻。所谓文化批判，很可能是把一支溃军带到了文化领域，去进攻一个比先前的攻击目标更不可攻克的目标。新目标叫“文化”，其实是精神领域里的空气，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张口即能呼吸，闭口即能知味，谁都能抓上一把到沙龙里谈谈，一松手，则什么都没有。这样的精神总攻，连唐·吉诃德都不如，唐·吉诃德前面还有一架具体的风车；这样的文化批判，清风逐流云，荆轲

刺孔子，只能配中国文人的胃口。

我无意贬低法兰克福学派。我只是忍痛提示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法兰克福在西方历史长时段演变中的位置，二是中国文人好谈法兰克福的接受心理。西方批判理论发生那样一场长时段的蜕变，受制于精神史背后更为复杂也更具悲剧因素的历史背景，需要的是同情，是扼腕，甚至应该跟在他们的后面，指挥一支交响乐队，反复演奏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为他们伴奏，为他们送行。然而，白事不是红事，暮云不是朝霞，总不能在人家办丧事的时候去当啦啦队，抢过挽联当旗帜？更不能兴高采烈，争抢人家的丢盔弃甲，捡到篮里就是菜。

大概是在 70 年代，李敖曾经写过一篇很辛辣的文章，题目似乎叫《给好谈文化的人治治病》。这个李敖，有很多地方不能让我接受，但是这篇文章却至今不敢忘却。我以为，中国人若真想为中国文化好，在目前的情况下，最好少谈文化，至少不谈文化批判，晾干文化问题里的水分，让那个文化痴肥症逐渐萎缩。

（本文初次发表于《读书》1997 年 11 月号）

启　蒙　三　题
——笑着的、叫着的、哭着的

法国人说，伏尔泰笑着，狄德罗叫着，卢梭哭着。这三个人的嬉笑怒骂，穿越那个“理性时代”，直落我们今天存活的这个世纪……

伏尔泰的笑声，是伏尔泰主义的特征。狄德罗昵称他为“湖边的老土匪”，几分亲密，几分微议，似嫌他不该用笑声去作战。狄德罗毕竟年少气盛，不明白敌手之低下，不值得用更正规的武器去应对。伏尔泰只有以笑声迎战，才不致辱没自己的智慧，才不致忽略对方的愚昧。

伏尔泰老是拿“教会的荣誉”、“宫廷的尊严”开玩笑。他说，从前有一个泥腿子，叫“老实人”。“老实人”进城遇到了六位欧洲废君，失去王位却呈泼皮威风，吃饭赖账，遭到意大利人的奚落哄笑。“老实人”起初不可思议，后来又听说宫廷社会暗中还流传有一种脏病，方有所悟。那脏病翻过来是一页“病历”，翻过去就是欧洲联姻王室的“家谱世系”：

侍女的病是一个方济会神甫送的，神甫的病得之于一个老伯爵夫人，老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骑兵上尉，骑兵上尉得之于一个侯爵夫人，侯爵夫人得之于一个侍从，侍从得之于一个耶稣会神甫，耶稣会神甫当修士的时候直接得之于哥伦布的一个同伴。

伏尔泰言罢，随即就是一阵开怀大笑，连马克思都听到了这一阵笑声。《马恩全集》第十三卷 435 页记载有马克思耐心描述的一则轶事，说伏尔泰当年有四个敌手，他就在家中喂养着四只猴子，分别取名为那四个敌手的姓氏。马克思说：

伏尔泰没有一天不亲手喂养它们，不赏它们一顿拳脚，不拧它们的耳朵，不用针刺它们的鼻子，不踩它们的尾巴，不给它们戴神甫的高筒帽子，不用最难以想象的卑劣方式对待它们。

伏尔泰每年只有一天不笑，那就是圣巴托罗缪之夜。每到这一天，他不仅不笑，而且浑身发烧，大病一场。200 年前的那场宗教屠杀，惨死者达 2000 多人。巴黎各教堂的狰狞钟声.胡格诺教徒临死前的呼救声，魂牵梦回，声声在耳，使 200 年后的伏尔泰辗转反侧，不得安宁。

每到这一天，他给朋友写信，总署上一个怒吼着的名字：“écraser L’infâme——踩死败类！”后来干脆缩写为“écr.Linf”，以致有一个拆看他信件的检查官，竟以为这些信的作者确有其人，就叫 écr.Linf 先生。

伏尔泰的“败类”究竟何指？ 200 年来一直争论不清。搞历史的人有四种解释：天主教、基督教、所有的宗教、宗教狂热者。大概第四种解释比较可信。伏尔泰内心并不缺乏宗教感情，他排斥的是宗教狂热，不容异端。那才是走火入魔，是一切迫害行为、残忍行为的病根。

为此，他经常放下手头的著述，为街头的宗教迫害奔走呐喊。他为卡拉、西尔文、拉巴尔、康普等一切宗教迫害牺牲者鸣冤叫屈，官司一打就是 10 年、20 年，亦在所不惜；为此，他痛心启蒙运动内部的分裂，认为外面的宗教迫害断不能演变为同仁间的学术迫害。他和卢梭的争吵是启蒙运动最大的不幸，但到了垂暮之年，他还是向卢梭伸出了宽容之手。他曾同时向七个地

点发出邀请，请那个流亡者到他的隐居地来避难。某一天，空然有人诈喊：“卢梭来了！”

伏尔泰闻言，掷笔惊叫：“这个不幸的人在哪？快让他进来！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

伏尔泰在笑声中流泪，一生写有 15 部悲剧。最使东方人感兴趣的是他的《中国孤儿》，总标题为“五幕孔子伦理剧”。那故事原称“搜孤救孤”，在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却被伏尔泰移植为法语演唱，用来宣扬儒教文化中不畏强暴的精神力量，伏尔泰让得胜的成吉思汗向失败的中国士人如此述说：

> 你把正义和真理都在你一人身上完全表现出来了。打了败仗的人民来统治打了胜仗的君王。忠勇双全的人值得全人类尊敬，从今后我要改用你们的法律！

马克思读过这个剧本，后来总结为“征服者被征服”。伏尔泰如此崇奉这个“征服征服者”的文化，以至二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室内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他认为孔子训导的儒生讲究气节，讲究尊严，还讲究坐怀不乱，道德上远比巴黎文人来得清爽。他只有用中国的蓝花瓷碗，才喝得下巴黎送来的咖啡。

不过，他并不同意儒家一味崇古的原教旨主义，更不能想象那个《中国孤儿》可用来夜郎自大。借着与卢梭辩论，他微笑着说出以下意见：

> 中国在我们基督纪元之前两百年，就建筑了长城，但是它并没有挡住鞑靼人的入侵。中国的长城是恐惧的纪念碑，埃及的金字塔是空虚和迷信的纪念碑。它们证明的是这个民族的极大耐力，而不是卓越才智。

伏尔泰在哪里笑？一直笑到什么时候？1760 年，“老土匪”在答复别人提问时写道：“我在我的隐居地做什么？捧腹大笑；我将要做什么？一直笑到死。”

三十年后，巴黎人补行国葬，迎回了这位一直笑到死的哲人遗骨。塞纳河边，万人空巷。他的心脏装在一只盒子里，永久存放于国家图书馆。盒子上刻着他生前的一句名言：

> 这里是我的心脏，
> 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从此以后，人们才知道，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法国人为何把狄德罗称为“叫着的狄德罗”？猜想起来，大概是因为狄德罗在启蒙运动中最早叫出了无神论的口号，而且把这个口号叫得最响，也最为激烈？

在那个时代，人的激进与否，未必如后人想象——是以政治观点为标准，而是以神学观点为标准。伏尔泰也好，卢梭也罢，对尘世间的权威，一律是，说大人则藐之，碰上一个说一个，毫不留情。但对天国的权威，则是笔下留“神”，至多说到自然神论为止，从未走到无神论的一极。他们反对的是宗教狂热，而不是宗教本身。他们之所以保留宗教，与其说是认同宗教的认知

价值，毋宁说是保护宗教能够维系人心的道德功能。在这个意义上，伏尔泰才说：“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谁能料想，就这句话被我们的教科书作者抓住了尾巴，如获至宝，到处引用，非说人家保守，还“代表了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唯独狄德罗称心，唯独狄德罗勇敢。他不仅与宗教狂热作战，还直接向宗教本身宣战。《百科全书》中狄德罗写得最多，共计条目 1296 条，凡是能够抨击上帝的地方，他都不放过，竭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他在无神论旗帜下召来两个泼辣写手——霍尔巴赫、达兰贝尔，吓跑了伏尔泰，也惹恼了卢梭。狄德罗之所以被捕，不在于他的文字有辱陆军大臣的情妇，而在于他《给有眼人读的论盲人的书简》，触怒了僧俗两界，也触怒了包括启蒙派知识分子在内的法国思想界。无怪乎拉美特利有一次说到，狄德罗只借助一个盲人就开导了整个宇宙，而他自己却被关进了漆黑的监狱。

200 年过去，人是由上帝创造，还是从猿猴演变而来——已成了一个愚蠢的论题，不值一辩。但是，因为真理的事后普及，也可能会造成一个历史前置的错觉：既是如此简单之常识，那么当然是谁叫得最早，谁叫得最好。事实不然，法国革命当年因无神论激烈而出名，也因为无神论激烈而蒙受灾难，付出了过多的代价……

代价之一，是激起了全欧洲的反动。笃信宗教的农民首先从旺岱起事，迅速蔓延至法兰西全境。全欧洲僧俗两界在“圣战”的旗号下扭结起来，向无神论的巴黎宣战！巴黎人坐守孤城，成了“一小撮”，成了“极少数”，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老鼠”再革命，“街人”再反动，力量悬殊却是就此铸成，怎么也扳不过来了。

代价之二，是使革命党的革命哲学本身因此扭曲，从扭曲也走向“反动”。大革命摒弃宗教以后，社会动荡，人心道德无所维系。革命党不得不强化道德说教，强化政治与道德的联系。凯撒与耶稣集于一身，反而出现了自己本身极欲反对的专制倾向：政教合一。罗伯斯庇尔说：“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一时传为革命名言，实际上包含着多少无奈，多少尴尬。美德从前以对上帝的敬畏为基础，上帝抽空，美德只能借人们对恐怖的敬畏而行。美德与恐怖结伴，既恶化了政治，也败坏了美德。不道德，强迫你道德，不自由者，强迫你自由，实际上是制造假道德，伪自由。这与大革命之初衷——人人生而自由——相差何止以道里计？

百般无奈，左右尴尬，罗伯斯庇尔不得不自己穿上了袈裟。1794 年 5 月，大革命推倒神龛，又设祭坛——建立最高主宰节，罗伯斯庇尔主祭开教大典。同一年，罗伯斯庇尔开始清算无神论。在一次拿破仑称之为最出色的演讲中，罗伯斯庇尔点出了百科全书的名字：

> 这一派人以极大热情传播唯物主义，远远不满足于仅仅摧毁宗教偏见。实用哲学的很大一部分就渊源于此。它把利己主义变成体系，把成功看作正义和非正义的尺度，把世界看作狡猾的骗子手的资产。这一派人包含为数众多的野心勃勃的江湖骗子！

法国革命最热闹的场景，美国人形容为：“那全是帆，没有一根锚。”法兰西不是没有维系人心的锚链，那是百科全书派过早过激的宣传斩断了这根锚。千帆竞渡的结果，大革命堤溃水漫，一片汪洋。罗伯斯庇尔恨恨而言，那不是革命，那是“一场国内战争，国际战争，还兼一场宗教战争”。到头

来，最激进的革命党，在革命最激 进的阶段，不得不反过来啃噬最激进的革命学说——唯物主义无神论，1794 年的这一幕，不仅令狄德罗难堪，也令后世一切跟着叫的教科书作者难堪。由此看来，伏尔泰说的“没有上帝，也要创造出一个上帝”,虽然刻薄,不也道出了几分大革命运行轨迹的客观 必然？至于这个“湖边老土匪”所说——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那更是至理名言。能不能类此推出狄德罗的逻辑呢？——谁叫得最早，谁叫得最好？那就不是逻辑了，那是狄德罗的教训，那是狄德罗的遗憾。

一谈到卢梭，感觉大变。是贬？是抑？是厌？是喜？——都不能达意。谈伏尔泰时的轻松，谈狄德罗时的讥诮，是怎么也保持不住了。

谈点卢梭与启蒙运动的分裂吧。

伏尔泰曾挖苦过卢梭：“读尊著，使人渴慕四脚爬行”；狄德罗曾抱怨他的“每一个思想，都受到了卢梭的干扰”，说他们这群人与卢梭的分裂，“是天堂与地狱的分裂”。

是什么样的分裂，使得这群人坐立不安，恨声不绝呢？

分裂之一，是卢梭的历史哲学：他控诉文明进步的罪恶。这是最触犯启蒙学派忌讳的地方。启蒙的旗帜是“理性”，启蒙的基石是“进步”。而卢梭却在森林中徘徊沉思，忽如狼嚎般狂吼：“文明是道德的沦丧，理性是感性的压抑，进步是人与自然的背离，历史的正线上升，必伴有负线的倒退，负线的堕落……”

分裂之二,是卢梭的政治哲学 :洛克算老几？英国代议制又是什么东西？殊不知他卢梭痛诋之物，恰是老伏尔泰最心爱的东西。伏尔泰终身不渝，信奉的就是洛克思想，英国制度。卢梭却从本土笛卡儿那儿借得一块先验论资源，独辟出大陆一派政治哲学：以第一原理演证政府与社会来源于一纸契约，既如此，有履约者悔约，就有订约者毁约。于是，革命有理，造反无罪，老百姓就有了起义权、弑君权、推翻政府权、再订契约权，等等等等……

分歧之三，是卢梭的社会哲学：老伏尔泰风度翩翩，出入于上流客厅；小卢梭则是风尘满面，仆仆于街头鼓动。伏尔泰欣赏有教养者的清明理性，那才是社会稳定的柱石；卢梭则鼓噪无套裤汉的汹汹怒气，街头自有活水来，有道德，有激情，方能荡涤上流社会的污泥浊水……

法国大革命失败，启蒙运动灰飞烟灭，卢梭哲学成了下一个世纪、再下一个世纪的百年笑柄：

19 世纪的德国历史主义学派敲打着卢梭的庐墓，笃笃有声：“拿出考古证据来，证明你的社会契约来源于远古时分，有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书面合同！”

20 世纪的英国分析哲学则指着希特勒的肖像，数典骂祖：“从雅各宾专政到冲锋队运动，历史上举凡浪漫主义的精神狂热，哪一样找不到他卢梭思想的罪孽？”

人们把法国革命的恐怖，归咎于卢梭；把 200 年来旧大陆起义成瘾，革命成疯，也归因于卢梭，归因于狂想乌托邦，说大陆学派是潘多拉的盒子。

耳闻身后骂声不绝，小卢梭冥府垂泪，当该继续哭诉；老伏翁则应称心如意，捻髯含笑了。可是，如果让另外一群哲学家比如康德，比如罗尔斯，比如韦伯，来作评判，又该作何感想呢？

康德说：我没有激情，却能掂量卢梭的分量。我的客厅从来只挂牛顿和卢梭的画像。牛顿指向理性数轴的无穷大，卢梭则指向同一根数轴的相反方

向。你们都说，学哲学者必先通过我康德这座桥，你们知道不知道，我康德首先通过了卢梭这座桥？

罗尔斯说：我积二十年心力，写成《正义论》一书，本世纪 70 年代方才出版。我没有改换卢梭政治哲学，只是移动了一下它的立论基础，从杜撰一场远古契约移到了严密的逻辑论证。假设也有一道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从头罩下，社会中人谁也不知道自己在既存秩序中是受害还是得益，人们的选择将会怎样？我以数学方程演证出的模式，恰与卢梭当年用契约合同推测的结论相合：人们将不约而同，奔向卢梭那把大镐，刨出社会老根，刨出一块价值重建的空白起点。

卢梭以激情见长，他的契约论是诗；我以冷静著称，我的正义论是数学，想不到诗的语言和数学的结论竟不谋而合。由此可见，以法国革命成败论卢梭、伏尔泰之成败，以欧洲 200 年历史成败论大陆、英美学派之成败，是否为时尚早？

韦伯说：经验论、英美派根在历史，或可称为工具理性。先验论、大陆派根在逻辑，或可称为价值理性。可悲的是，人类理性有两股源头，社会发展却只有一条河床。当两条大河争夺一条河床时，或是江河改道，或是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这就是法国革命式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当然不该重演了。但是，人类切不断历史，也离不开逻辑。前者是长度，累计人类历史之渊源；后者是宽幅，测量人类自由意志之探险，人类精神借此获得二维空间。若要进入三维空间，向第三维——高度飞跃，必须历史与逻辑的共同扶持：历史作轮，提供足够的滑行速度，逻辑作翼，提供应有的起飞升力……

必作如是观，我们方能理解老黑格尔在启蒙运动之后的殚精竭虑：他为何提出人类史当是一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史？他为何留下那句睿智无比的格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他的这句格言如今已被用糟用滥。其实黑格尔本意，有着当时具体的针对性，是站在第三维高度上发言，凝结着他综合启蒙运动分裂，综合大陆、英美思潮分野的良苦用心：前一半总结的是经验论、工具理性、英美学派、伏尔泰，后一半总结的是先验论、价值理性、大陆学派、卢梭。也就是说，你卢梭喝令江河改道，要出大乱子，你伏尔泰占着河床不放，一水独霸，到头来也会水源枯竭，河底焦裂。你们两者齐力，一边拓宽河道，另一边疏浚淤泥，两河并作一水流，方能双源并下，交汇聚合，融入壮阔之海洋。

事实不也确然如此？

（本文初次发表于《读书》1991 年第 11 期）